

乌拉圭东岸共和国近代史研究（一）

（1828-1903 年）

供稿单位：北京交通大学乌拉圭研究中心。为服务国家战略和外交大局，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北京交通大学积极响应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开展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的号召，于 2017 年 12 月成立了北京交通大学乌拉圭研究中心。中心以语言与传播学院师资力量为依托，统筹校内外资源，重点对中乌关系、乌拉圭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等领域开展研究，为有关政府部门提供资政支持。

内容提要：《乌拉圭东岸共和国近代史研究》系列文章（共 4 篇）根据乌拉圭共和国大学（*Universidad de la República, Udelar*）原文历史资料研究、考证、撰写而成，研究对象为 1828 至 2008 年乌拉圭近代史，是乌拉圭研究中心《基础调研规划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简介：佟亚维，北京交通大学乌拉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建国是 1828 年阿根廷与巴西两国签署和平条约（*Convención Preliminar de Paz*）的结果。建国后，制宪进程随即展开，1830 年宪法（*Constitución de 1830*）应运而生。

1830 年宪法是同时期欧洲国家宪法的再版。宪法规定，乌拉圭的政体是代议制共和国；中央集权，地方各省拥有有限自治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分立，其中：

行政权方面，共和国总统为最高行政长官，任期 4 年，有法律动议权、否决权及地方人事任免权；由总统任命的省长在各自辖区内行使民事、军事、内政（警务）等行政权。

立法权方面，实行两院制，国会（*Asamblea General*）由参议院（*Cámara de Senadores*）和众议院（*Cámara de Diputados*）组成。国会的首要职能是选举产生共和国总统，其职能还包括制定法律、通过或否决国家预算、设立新税种、宣战、批准或否决政府缔结的各类国际条约。众议员由选民直选产生，任期 4 年，各省众议员数目由其人口数量决定；参议员通过间接选举产生，任期 6 年，每个省选举产生 1 名参议员。在各省议员选举中，得票多的政党获得该省全部议席，因此少数派不享有任何代表权。

司法权方面，高等法院（*Alta Corte de Justicia*）为最高司法机构，其法官由国会任命。

值得一提的是，1830 年宪法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进行了限制，选举人和被选举人均须满足财产要求。满足被选举人财产要求的公民被称为积极公民（*ciudadanos activos*），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财

产门槛以下的消极公民 (*ciudadanos pasivos*) 仅拥有选举权。同时，宪法禁止特定人群行使选举权，包括妇女、奴隶、流浪汉、有犯罪前科者、国家财政债务人、短工、侍者、文盲、残疾人、酗酒者、基层士兵等。

建国初期，乌拉圭面临三重困难。首先，文士 (*doctores*) 与军阀 (*caudillos*) 就政治生活主导权展开博弈，这一矛盾将贯穿 19 世纪的乌拉圭政治；其次，红党 (*divisa colorada / Partido Colorado*) 与白党 (*divisa blanca / Partido Nacional*) 间的党派斗争成为国内矛盾升级为武装冲突的致命隐患；最后，国民经济羸弱不堪，产权混乱、税收体系不健全等问题迫使政府不得不向私人大量举债。

建国后不久，国家权力阶层内部矛盾激化，总统奥利维 (*Ignacio Oribe*) 为限制军权，决定废除军队总司令的职务设置，时任总司令里韦拉 (*Fructuoso Rivera*) 随即发动政变。奥利维被迫流亡布宜诺斯艾利斯；1839 年，里韦拉控制蒙得维的亚，成为“事实总统”。对峙局面形成后，乌拉圭历史上历时最久的内乱随即爆发。

大战争 (*Guerra Grande, 1839-1851*) 是乌拉圭的内战，但外部力量的介入使其具有了国际争端的性质。首先，流亡阿根廷的奥利维依仗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罗萨斯 (*Juan Manuel de Rosas*)。此时，阿根廷国内统一派 (*unitarios*) 与联邦派 (*federales*) 分庭抗礼，奥利维与联邦派领导人罗萨斯结盟，使得里韦拉得到了统一派的支持。其次，罗萨斯政府执政时期损害了英国和法国的商业利益，因此遭到报复。在大战争中，英、法两国支持里韦拉一方。

1839 至 1843 年，战事不断。其中，最著名的两场战役是 1839 年的卡甘查河战役 (*Batalla de Cagancha*) 和 1842 年的格兰德河战役 (*Batalla de Arroyo Grande*)。奥利维在格兰德河一役中取胜，直逼蒙得维的亚市。1843 至 1851 年，蒙市遭到围困，奥利维在城北驻扎，双方相持不下。

至此，大战争已持续十年之久，英、法两国斡旋未果后相继退出战事，而巴西的介入催化了战争的终结。为遏制阿根廷的扩张，巴西决定支持里韦拉政府，共同对抗罗萨斯-奥利维集团。1851 年，里韦拉在卡塞罗斯山战役 (*Batalla de Monte Caseros*) 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同年 10 月 8 日，大战争宣告结束。

战后的乌拉圭满目疮痍，为争取民族和解，乌拉圭人以法律形式将这场旷日持久的本民族内战定义为无胜无负战争。然而，巴西对里韦拉的支持不是免费的，巴、乌两国随即签署的一系列条约在诸多方面限制了乌拉圭的主权。

里韦拉是红党领袖，奥利维是白党军阀。消除红白之争被视为将无胜无负战争转化为持久和平的路径。战后首位总统西洛 (*Juan Francisco Giró*) 尝试组建红党、白党联合内阁，但好景不长，由于两党间缺乏必要的信任，西洛政府倒台。红党文士无力组阁，遂求助于倚靠巴西的红党军阀弗洛雷斯 (*Venancio Flores*)，弗洛雷斯继而成为新任乌拉圭总统。

推动红白两党团结的努力仍在继续。1855 年，红党文士拉玛斯 (*Andrés Lamas*) 起草了团结宣言，指出当前乌拉圭的首要任务是进

行战后重建，两党在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拉玛斯甚至呼吁组建一个联合政党。这份宣言引起了红白两党军阀的重视，作为回应，弗洛雷斯和奥利维签署了《联合协议》(*Pacto de la Unión*)，同意致力于避免党派斗争，并同时宣布放弃竞选共和国总统。

在此背景下当选的佩雷拉总统 (*Gabriel Pereira*) 继续推动建立联合政党。但事与愿违，红党怀疑总统亲白，从阿根廷起兵攻入乌拉圭。乌政府军强力镇压并在金特罗斯集体枪决了起义官兵 (*Fusilamientos de Quinteros*)。红党对白党更加怀恨在心。

继任总统的贝罗 (*Bernardo Berro*) 继续推动消除党际斗争，且做法更加激进。贝罗计划剥夺省长的军权，而各地省长恰恰多为地方军阀；贝罗企图限制教会的权力，并驱逐了主教维拉 (*Jacinto Vera*)；在外交方面，贝罗希望通过联合巴拉圭抵制巴西和阿根廷对乌拉圭的干涉，但未能说服巴拉圭放弃其孤立主义外交政策。

面对贝罗的政策措施，弗洛雷斯、维拉及红党在阿根廷组成反政府阵线，并得到了巴西和阿根廷的支持。1863年，反政府军攻入乌拉圭，并于1865年攻陷港口重镇派桑杜。作为对金特罗斯事件的报复，白党守军官兵被集体枪决 (*Fusilamientos de Paysandú*)。弗洛雷斯乘胜建立政权。

发生在乌拉圭的这次政变是同时期本地区三国同盟战争（又称“巴拉圭战争”）的一部分，三国同盟指的是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而讨伐对象是邻国巴拉圭。乌拉圭并非战争主力，但为盟军提供军需却拉动了其经济增长，使得弗洛雷斯政权得以存续。

弗洛雷斯掌权意味着军阀政治和政党政治的复辟。红党政府大行其道，无视宪法，操纵选举。在此背景下，白党上下、红党文士甚至部分红党军阀开始策划颠覆弗洛雷斯政权。

1868年2月19日，弗洛雷斯遭到暗杀，但叛乱并没有成功。当日，自称反对派领袖的贝罗被捕并遭处决。乌拉圭政治再次陷入混乱。

尽管政治领域混乱不堪，但这一时期的乌拉圭经济却表现良好。此时的乌拉圭经济以农牧业为主，大战争后农村一片萧瑟，战争使牛的存栏数锐减，农业收成勉强糊口。战争的结束使农牧业出现转机，短短十年内，牲畜存栏数倍增。这反而导致牧场面积难以满足需求，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现象。面对这种情况，牧场主们开始将资金投向羊毛的生产。

与养牛相比，养羊需要的牧场面积小，获得牛肉需要屠宰牲畜，获得羊毛则不需要，且羊毛不断生长。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欧洲市场对羊毛的需求旺盛。欧洲的需求主要来自英国纺织业，受南北战争的影响，美国对英国的棉花供应中断，这为乌拉圭向英国等欧洲国家供应羊毛提供了巨大商机。在外部需求的拉动下，乌拉圭国内兴起了一场“羊毛革命”（*revolución lanar*）。

在“羊毛革命”的推动下，出现了一批中小牧场主，他们起初租用大牧场主的土地养羊，而后利用积蓄购置自己的土地。很快羊的存栏数成倍增加，农村地区的产权结构发生变化，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但与此同时，大量土著高乔人成为佣工，逐渐走向社会边缘。

十九世纪60年代，国际贸易成为乌拉圭外向型经济的重要收入

来源，一批大商人、中间商积累了雄厚资本。河港城市萨尔托(*Salto*)、派桑杜(*Paysandú*)成为转口贸易枢纽，来自巴拉圭、阿根廷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等地的商品经由萨尔托、派桑杜到达蒙得维的亚，继而输往欧洲各国；来自欧洲的进口商品则沿同一航路反向流入。国际贸易为蒙得维的亚创造了可观的海关收入，关税成为乌拉圭政府的首要财政收入来源。尽管如此，国家财政仍然入不敷出，政府不得不向私人举债。1848年，大商人联合成立了关税权买断公司(*Sociedad Compradora de los Derechos de Aduana*)，向国家预支非全额关税收入以赚取差价。同时，大商人购买国债并向政府提供高利贷，政府则以土地、公共财产等作为抵押担保。1856年，国家对私人的债务已达财政预算的50倍。

资本的聚集催生了第一批银行，1857年，民族资本的商业银行(*Banco Comercial*)成立；同年，巴西资本的玛乌阿银行(*Banco Mauá*)成立；1863年，英国资本的伦敦和拉普拉塔河银行(*Banco de Londres y Río de la Plata*)成立。

一时间，乌拉圭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然而，发迹的商人并没有将资金投入到实业领域，为追求短期利润，他们选择了发放高利贷和购买债券。此外，富商们大量购买进口奢侈品，这使得随出口收入流入乌拉圭的黄金旋即流出，贸易赤字逐渐增加，这就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随着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束，国际市场羊毛价格开始下跌；同时期，伦敦数家银行破产，英国对乌投资骤然减少。在乌拉圭国内，比

索可与黄金进行直接兑换，且铸币权分散，货币发行混乱。银行本应以黄金储备为限制发行货币，但在浮华的经济景象中，部分银行家无视相关规定，大肆印钞。银行储户因此类消息而感到恐慌，纷纷要求将纸币兑换为黄金。部分银行无力应对挤兑浪潮，濒临破产。为应对银行业危机，政府决定暂停实行金本位制，推行使用与黄金脱钩的货币（*curso forzoso*）。尽管如此，此次金融危机仍给乌拉圭经济和社会造成了严重影响。

金融危机未平，政治危机又起。1870年，红党总统洛伦索·巴特列（*Lorenzo Batlle*）受到来自白党军阀阿帕里西奥（*Timoteo Aparicio*）的挑战，乌拉圭再次陷入内战。这是乌战争史中最后一次使用长矛作为武器的战争，故史称“长矛革命”（*Revolución de las Lanzas*）。残酷血腥的内战直接伤及羊毛产业，精英阶层呼吁交战双方和解。1872年，《四月和平协议》（*Paz de Abril*）得以签署。根据该协议，白党获得了4个省的省长职务。

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一股新兴政治力量：原则派（*principistas*）。原则派中有红党人士、白党人士和独立人士，主张将奉行相同原则的各界人士联合起来，原则派的首要原则是法律至上，法律效力高于武力，高于政党利益。1873年的国会（*Cámaras del 73*）成为原则派人士高谈阔论的场所，有些辩论内容抽象、脱离实际，但其中关于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讨论不乏进步意义。

红党背景的巴莱拉总统（*Pedro Varela*）对原则派实施压制政策，部分原则派人士发起三色革命（*revolución tricolor*），企图推翻现政府，

但很快被战争部长拉托雷（*Lorenzo Latorre*）镇压。对巴莱拉经济政策不满的大牧场主、富商、银行家借机推举拉托雷执掌大局。1876年，巴莱拉被迫辞职，拉托雷上校出任临时总统。

拉托雷当政的3年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经济、加强行政管理，包括严格履行偿债义务，规范金本位制、回笼流通领域过剩纸币，加强公款审计等。

在农村，政府开展了所有权确认工作。通过拉网围栏，明确牧场边界，明确牧场主所有权范围。但拉网围栏费用高昂，只有大牧场主有能力支付，加之政府强制实行平摊制，要求毗邻牧场的主人各自支付拉网围栏费用的一半，导致众多中小牧场主只能把土地出售给更富有的邻居，土地价格由此上升了。同时，颁布实施农村法规（*Código Rural*），实行品牌注册制，严惩牲畜偷盗，规范雇工行为。这些做法提振了生产者的信心，他们纷纷投资改良牲畜品种、提高产品质量。1871年，政府专门设立乌拉圭农村协会（*Asociación Rural del Uruguay, ARU*），推动政策落实工作，并建立了新警种——农村警察。

拉托雷的政策措施推动了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乌拉圭确立了农业出口国、“资本主义世界粮仓”的国际地位。但同时，经济现代化的社会成本不容忽视，拉网围栏等做法使大量以看护牧场为生的农牧民失业，他们的生活条件每况愈下，沦入赤贫。

政治方面，尽管拉托雷政府中不乏文士，但其政权的本质是军事独裁。拉托雷统治时期，宪法及分权制被废止，公民政治自由被取缔，反对派遭到迫害，独裁者仅凭一纸关押令就能让被捕者不经审判

而直接入狱服刑。

拉托雷采取措施强化国家权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管辖，在各省指定法官，利用电报、邮政等新型通讯方式加大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度；大力推动军队建设，配备现代化武器装备，严整军纪，发展铁路运输以提高军队调集效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举措推动了国家政治管理的现代化发展。同时，拉托雷建立了民事登记制度 (*Registro de Estado Civil*)，负责出生登记、死亡登记、婚姻登记、公证认证等工作，社会世俗化有所发展。

在教育领域，拉托雷任命巴莱拉 (*José Pedro Varela*) 为公立教育局长。1876年起，巴莱拉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乌拉圭基础教育进行了改革，指导改革的三项原则是义务教育、免费教育和世俗教育。免费教育是义务教育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兴建校舍，鼓励农牧民家庭把孩子送进课堂；世俗教育的主张因天主教教会的抵制未能付诸实施，但如父母明确表示拒绝接受宗教教育，其子女可免修宗教课程。1877年，政府颁布全民教育法令，设立基础教育国家巡视员一职，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经过改革，学校数量大幅增加，培养方案和教学方法得到改进，乌拉圭还建立了第一批师范学院。有人批评巴莱拉效力于独裁者，而巴莱拉认为，只有教育能够塑造自由的人民，只有教育能够避免未来的独裁统治。

拉托雷的继任者是比达尔 (*Francisco Antonio Vidal*)。在比达尔的短暂执政时期，军权的地位不断上升，直至桑托斯 (*Máximo Santos*) 上校当选总统。桑托斯的阁员全部来自红党，这自然招致白党的反对，

而他专断的行事风格，也引起部分红党人士的不满。他大行军国主义，给予军人诸多特权并大幅扩充兵力，以示权威。在政治方面，桑托斯继续奉行拉托雷的集权政策，增设中央部门，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同时，继续推进社会世俗化，1885年起实行民事婚姻义务制。

桑托斯首个任期结束后，比达尔重新当选总统，但这只是桑托斯为再次执政所做的政治迂回。随后出台的两部法律为桑再度执政铺平了道路。第一部法律放宽了高级军官当选议员的限制；第二部法律设立弗洛雷斯省（*Departamento de Flores*），桑托斯随即成为该省参议员，而后被任命为参议长。1886年5月24日，比达尔辞去总统职务，参议长桑托斯出任共和国总统。进入第二个任期，桑托斯行事更加专断，国家财政管理一片混乱，政局动荡加剧。迫于时局压力，桑托斯同意恢复宪政、举行大选。1886年11月4日，协作部（*Ministerio de Conciliación*）宣告成立。随后，桑托斯辞去总统职务，流亡欧洲。

桑托斯执政期间奉行的军国主义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满，来自舆论界的批评使当权者陷于被动。尽管遭到新闻审查，《民主报》（*La Democracia*）、《先驱报》（*El Heraldo*）、《真理报》（*La Razón*）、《论坛报》（*La Tribuna*）、《每日报》（*El Día*）等多家报社仍然展现出了舆论的力量。

十九世纪80年代的乌拉圭经济在英国资本的拉动下呈现出繁荣景象。英国公司掌控了铁路、供电、自来水、天然气等基础设施和服务。英资企业无处不在，在乌拉圭建立起“非正式不列颠帝国”。然而，过分依赖英国资本成为乌拉圭经济的结构性弊端，同时，大量商业利

润流向国外。

大牧场主继续通过改良畜种增加牛肉和羊毛的产量。这一时期，羊毛首次超过牛肉和皮革成为首要出口产品。工业在移民的推动下逐渐兴起，主要从事食品、饮料、鞋、家具等消费品的生产。政府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也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随着 80 年代的经济繁荣，投机行为再度滋生，股票市场骤然活跃，新成立的银行和股份公司比比皆是。1887 年，大商人雷乌斯 (*Emilio Reus*) 建立国家银行 (*Banco Nacional*)，向政府提供贷款，同时经营农业贷款、抵押贷款等业务。

1890 年，英国经济陷入衰退，乌拉圭再度爆发经济危机，国家银行等多家银行和近千家商户纷纷倒闭。出口下降使外汇收入减少，进而导致贸易收支和国际收支失衡。国家财政亏空，政府不得不削减公职人员薪酬，甚至一度用欠条支付工资。

十九世纪末期的乌拉圭社会呈现出多元性和等级性。多元性来自移民，工业化进程使众多欧洲农民不得不远走他乡，从 40 年代到 80 年代，大量欧洲移民涌入乌拉圭，其中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居多。外来移民带来了多元的文化，并很快成为乌拉圭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等级性即社会分层，包括保守阶层、中等阶层和平民阶层。

保守阶层既有财力，又有政治影响力，包括传统牧场主、现代牧场主、富商、银行家和英资企业的经理人；中等阶层包括新兴工业家、零售商和中小牧场主，他们构成了流动性最强的社会阶层；平民阶层包括城乡佣工、第一批产业工人、士兵、侍从和各行各业的零工。1865

年，第一个工会组织—印刷工人协会建立。到1904年，乌拉圭全国已有38个工会组织和1个工会联合会：蒙得维的亚港工人联合会。

桑托斯流亡国外后，其在军队内的余党被革职。塔赫斯将军（*Máximo Tajes*）任总统期间致力于恢复宪政，继任的埃雷拉-奥贝斯（*Julio Herrera y Obes*）再兴政党政治。他认为人民没有能力治理国务，所以将总统置于国会之上，率领亲随搞起精英政治。这种做法招致了白党和部分红党人士的反对。在白党弃权以示抗议的情况下，博尔达（*Juan Idiarte Borda*）当选总统。此时的乌拉圭还没有摆脱1890年经济危机的影响，更遭的是，萨拉维亚（*Aparicio Saravia*）于1896年、1897年连续发动了两次叛乱，使政局更加动荡。内乱的状态让精英阶层深感不安，他们担心自己的投资付之东流。平民阶层同样渴望和平，他们在首都组织大规模游行，要求总统开启谈判。然而，1897年8月25日，博尔达遭红党极端青年刺杀身亡。时任参议院主席古艾斯塔斯（*Juan Lindolfo Cuestas*）继任总统职务，并很快与反对派签署了《拉克鲁斯和平协定》（*Pacto de la Cruz*）。政府在协定中承诺推动选举改革，以确保少数派拥有代表权。同时，协定给予白党马尔多纳多省、弗洛雷斯省、塞罗拉尔戈省、三十三人省、里韦拉省、圣何塞省（*Maldonado, Flores, Cerro Largo, Treinta y Tres, Rivera, San José*）等6个省的省长职务，而省长在选举中的影响力可确保这些省份选出的议员将代表白党进入国会。和平协定签署后，在乌拉圭出现了两大权力核心：中央政府和萨拉维亚军阀力量。在和平环境下，古艾斯塔斯对国家进行了颇具成效的治理，从1897年到1903年，乌拉圭行政

秩序井然，经济持续增长。

频繁发生的政变、叛乱和内战使十九世纪的乌拉圭历史伤痕累累，有人甚至开始怀疑这个国家存在的意义。乌拉圭的有识之士认为，只有描述一部共同的历史，才能激发民族认同感，才有希望获得持久的和平。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开始塑造乌拉圭的民族精神，而这一民族主义需要一个英雄，一个早于政党政治时代的革命先驱者。最终，独立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阿蒂加斯 (*José Artigas*) 成为共同历史的核心，塑造民族精神、团结全体国民的事业由此展开。阿蒂加斯的伟绩、思想以及三十三人东征 (*Cruzada Libertadora de los Treinta y Tres*) 等同时期历史事件成为全国公立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

1849年，乌拉圭建立共和国大学 (*Universidad de la República*)，起初主要培养律师。1876年，学校设立医学系，结束了本国医生留学法国的历史。在共和国大学的校园里，自由主义者、理性主义者、实证主义者辩论交流、畅谈思想。1880至1899年，巴斯克斯·阿塞维多 (*Alfredo Vásquez Acevedo*) 出任校长，对学校培养方案进行了改革，颁布组织法规范高等教育。1887年，建立数学系，培养建筑、工程、测量等领域人才。1889年，国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中学的教育宗旨，直至1935年，中等教育才从共和国大学的教育体系中独立出来。■

2019.06.29